

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作用分析

曾永恒

(西昌学院 思政部,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首先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这一方向,于是由学习西方转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另觅出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3-0079-04

一

众所周知,五四先驱们揭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从西方远隔重洋请来的,并非中国本土生长的“土著居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新知识分子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思想是17世纪以后西方各种思想的大杂烩,而他们特别推崇的则是来源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1](P415)}其实,向西方看齐并非是五四时期所特有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P1469)}事实上,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是就开始了“别求新声于异邦”。首先觉察到的是“夷之长技”,认为中国在器物方面不如人先进,应该学习人家的“船坚炮利”。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略有见识的、开明的地主阶级实力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师夷之长技”,以扭转颓势。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仅仅学习器物是行不通的。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先进的中国人,西人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器物而在于较深的政治文化层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变法革新,企图进行君主立宪,以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终究无力回天。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建立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辛亥革命,一举埋葬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然而当时资产阶级共和国处于浸染太深封建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下,经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打击,这块招牌名存实

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须从思想文化上对封建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方能奏效。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五四先驱们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借助的武器仍是西方的“老家当”——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其中的核心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

二

然而,这种长期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把它当作中国学习、仿效的榜样的局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风向”有了迅速的转变。一向推崇的西方文化受到了质疑,先进中国人在向“西”的道路上迷茫了,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便踟蹰不前,不禁扪心自问中国向何处去?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两败俱伤,昔日高度繁荣西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顷刻间化成了一片废墟和瓦砾场,所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不但西方国家许多人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之中,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西方文明“没落了”,而且在中国也出现“资本主义文明破产论”。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都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出发,纷纷直率地表达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一种墙倒众人推之势。一部分人重新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东方文化,成

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西化”也由此产生重大分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向同样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大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大为减少了。

1920年,曾经讴歌过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在游历了一战后疮痍满目的欧洲之后返回中国,整理了他在西欧耳闻目睹的观察和感悟,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文,在文章中他用自己“常带感情”的笔端描述了战后西方人凄惶、失望、不安的复杂心态,由此断言曾敬慕已久的西方凭借科学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要从“别求异声于他邦”转向我们祖宗留下的“金饭碗”——儒家文明,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欧洲。梁氏的上述预言,实际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欧洲资产阶级凄惶不安的悲观情绪在其文章中的折射。他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主体,吸取一些西方文明,构成新的文明。并幻想用这种“新文明”去拯救和超度处于行将破产的西方物质文明。他说的“以中补西”论,实际上是重新用“孔化”来代替“西化”。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文化界炸开了锅。紧接着,1921年1月,陈嘉异发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明确宣布自己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反对一切赞扬西方文化及融合东西文明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优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必然会成就将来的世界文化。

与梁启超、陈嘉异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怀疑批判的言论相比,更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著作是梁漱溟在1921年秋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漱溟是代表着文化保守主义持守旧立场的重要人士,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理论上比较系统的反思和总清算。此书的基本论点是: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属于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向”,欧洲的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的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的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P422-423)}在上述“三路向”划分的基础上,梁漱溟断言这三种“路向”的不同,实际上是三种文化的不同,其间并没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别。而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上看,在西洋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化,因科学发达、物质进步,现时已经暴露出众多弊端,其人生哲学已经走到末路,整个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地步,可见西洋的路向已经走不通了。而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明

时代又没有到来,因此,时下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第一路向过渡到第二路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化要想摆脱危机,就必须走中国文化的“正道”。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序言里,梁漱溟写道:“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4](P543-544)}很显然,梁漱溟以极为独特的视角来批判西洋文明,他通过“文化三路向”的理论图式,向世人宣告,西洋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由于梁氏的批判论是建立在精致的思维、系统的构架和哲理辨析的基础上,因而其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强的震撼力。也许这次打击沉重又致命的缘故,使得许多本已摒弃儒教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恰如其时就如一根救命稻草。

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第三阶段,除了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批判之外,文化激进主义者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更加坚定彻底。其中以瞿秋白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章最具代表性。在文章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由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5](P380-381)}西方文明尽管在20世纪已百病丛生,但与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相比,“这种技术文明还是包含更多的科学成分。”^[6]但与社会主义相比,二者则都应摒弃。他断言: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而且这个伟大的运动将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那不但自由的,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6]虽然瞿秋白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深入全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但他终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犀利的思想武器,试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规律做出深层次的阐释。同时,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敲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嘹亮的晨钟,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

的深度。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精英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对中国摄取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陈独秀等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以法兰西模式为榜样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他们以人权说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他们坚信:“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7]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他们理想中乐土和天堂。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强盗世界的侵略掠夺本质,开始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起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激烈批判。与此同时,他们将目光投向北方的苏俄,开始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方案来改造中国社会。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思想转变。

三

如前所述,俄国十月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改变“风向”的作用。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新文化运动有原来的“西风”(西化思潮)转为“东风”(以中国传统文化或东方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北风”(以北方俄国十月革命为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眼前一亮,从而改变他们的人生方向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一,十月革命给中国青年苦苦思索、孜孜追求的救国救民问题,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准确,它所产生的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看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一种偶尔涉及,并没有给以认真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苏俄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夫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奋斗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依靠力量,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二,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开始形成了两大阵营,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巴黎和会上,欧美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宰割中国,打破了国人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积极支持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与帝国主义相反,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中国因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和“废除一切特权”等^{[8](P360)}。宣言还表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8](P361)} 1919年,苏俄为了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还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这样也就给彷徨无适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走俄国之路——这就是结论。^{[2](P1471)}三,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在寻找中国的解放道路时,都力图避免经过资本主义苦难的“涤罪所”(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绝非最终理想),以不同方式追求“大同”理想。现在,他们从俄国看到了这种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的描述,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文化上的契合。上述的这些原因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从老是欺辱中国的、按照民主和科学建立的、原来被当作教师的西方国家,转向了帮助反对帝国主义、平等相待、给中国人民解放以希望的莫斯科。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钊一向最为关切时政,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最早。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称颂“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9]同年11月,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0]李大钊以震人心弦的新声,唱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曲。从1918年起,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共写了100多篇相关文章。他是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得以树立的第一位奠基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认识到十月革命道路并转到这条道路上的先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李达写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11](P30)}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

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12][P112]}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也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产物。李达在1919年6月这样说:“法兰西革命,虽是推倒皇帝的专制,打破了贵族的阶级,灭除寺院僧侣的特权,但所有成功只算政治的成功。”“结

果弄到贫者愈贫(这是劳动者),富者愈富(这是资本家),贫富相差愈远。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革命后文明现状。社会上受了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13][P4]}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认识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十月革命不过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触媒,它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中国人民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中国人民转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8.
- [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A].梁漱溟全集第一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5]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A].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 [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J].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 [7] 陈独秀.抵抗力[J].新青年,第1卷第3号.
- [8]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A].五四运动文选[C].北京:三联书店,1959.
- [9]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J].言治季刊,第3册.1918,7,1.
- [10]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J].新青年,第5卷第5号.
- [11] 李达.马克思还原[A].李达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80.
- [12]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A].吴玉章回忆录[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 [13] 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A].李达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ZENG Yong-h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In the May Fourth times,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s a movement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but is transformed by the result of World War I, turning to cultural conservatism one or other ways, and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World War I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it changed to Marxism.

Key words: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World War I;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责任编辑:李进)